

0407

壽陽文史資料

第五輯

政協壽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 寿阳文史资料

## 第五辑

政协寿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EAZ9/41

政协寿阳县第五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 问：岳守荣 弓有芳

主 任：赵 进

副主任：白长生 闫振新

委 员：丁维纲 李芝仁

张瑞仙 郭磐石

崔志进 傅瑞萍

# 目 录

编 者.....	1
祖父的市长生涯 .....	1
祖父在什么情况下出任天津市长的 .....	1
祖父为实现“三民主义政治”之奋斗 .....	9
祖父为繁荣天津之奋斗.....	25
祖父为天津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之奋斗.....	43
祖父为市政建设筹款及公共慈善事业之奋斗.....	55
祖父命运之悲剧与觉醒.....	70
重视教育的天津市长崔廷献.....	94
边大绶遗事追踪 .....	100
李自成祖墓被掘始末 .....	101
边大绶被执后从寿阳逃脱经过 .....	109
附记 .....	117

崔廷献(1875—1942年),是我县尹灵芝镇(芹泉镇)库仓村人。清末民初在社会上颇有名气,官至天津特别市长。清光绪年间,在山西人民向英帝国主义福公司的争矿权斗争中推为代表,他英勇机智,表现卓著,时人多有称颂。他主政天津市时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识时务,明大义,能听从共产党人张友渔的劝道,毅然解散“自新院”,将关押的薄一波等三十六名中共党员及政治犯全部释放,无疑这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大业值得称道的好事大事。今天,我们将其孙女搜集整理的生平事迹发表,虽是一家之言,尽管还不那么全面准确,但对了解近代历史,研究社会将有所启迪。

——编者



## 祖父的市长生涯

● 崔港珠

祖父在什么情况下出任天津市长的

1875年(清光绪元年),祖父出生于山西寿阳县一个贫寒农民家庭,兄弟二人,依靠父亲和弟弟种田供他读私塾,他亲身经历了农人种田的艰辛和生活的贫困。16岁以童子试第一名入学,

在当地初露他的聪慧,1898年考取优贡,1901年辛丑科进士。但就在他结婚时,家境依然是贫寒的,入洞房的当晚,他对新婚的妻子说:“快把手上的两个银戒指摘下来,那是借的,说好晚上要还人家的。”祖父想要改变生活这种贫困局面,而他的青年时代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亡加重,他亲身经历了清政府无能,被迫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又值戊戌变法的影响,1904年他与许多爱国知识青年一样赴日本法政大学研究政治经济法律等科,寻求御侮强国的办法。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纲领。祖父与汪精卫等法政学子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纲领,并开始为之奋斗,他是“晋政界中入国民党最早”之一。(《大公报》1929年7月28日第十一版)1905年冬他回国,正值山西民众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西开矿权的斗争开始了。祖父开始在山西大学堂被西斋学生推为代表,“根据《万国公法》向英人交涉。他理直气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应付。英福公司对西斋学生

用尽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无丝毫效果”。（《山西文史资料》）依祖父之才能和雄辩的口才，祖父又被推举为山西全省争矿代表，到北平政府去请愿，与英国人交涉，到1907年底，终于把英国人赶出山西，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这次护矿、争矿斗争的胜利，使祖父救国的信心倍增，他感到只要民众真正觉悟起来，中国就有希望。他的才能也被清政府所利用，先后任命他为山西省农林、实业、铁路等学堂协理，奉天葫芦岛开埠局局长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回山西任内务司司长兼财政司司长，并代行民政长事。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1902年他报名参加了清政府培养下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为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日本士官学校，他的同乡赵戴文也同时被保送去，因身体不好改学师范。1905年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他与赵戴文同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的另一个同乡是南桂馨（山西宁武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入日本高级警察学校。他们回国后，在清政府军队任职，按

照同盟会的指示，进行了打倒满清，创立民国的武装斗争。1911年利用清军中的革命力量组织发动了辛亥太原起义，但在娘子关大战中受到清军的顽强抵抗，起义首领姚以价急待阎锡山帮助的时候，阎却一方面把起义军内部实情报告给清使，并把自己的部队开出城外，使姚没有退路。另一方面自己逃往归绥，并派赵戴文到北京投降袁世凯，说山西之乱均姚一人造成，如能除姚，则大家无一不从命于袁，袁世凯大嘉奖阎锡山有见识。不久共和告成，袁世凯为欺骗国民党，遂以阎锡山掌山西军民两政，阎锡山送父母到北京住家以为人质”。（《山西文史资料》辛亥太原起义追记）

“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实权，必须用几个五台人，再加几个崞县、定襄人协助他掌握，这是他统治山西不变的原则”。“赵戴文是唯一拥护他的人，他的一切措施多商决于赵，一般人认为阎、赵在政治上形同一人。赵亦常说：我自识阎以后，即定了君臣之分。赵对阎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凡阎的言论行动，总是一味附和，并且引经据典予以阐述。但阎对赵还留有后手。如阎



勾结日寇的事，知道这位务虚名的道学先生不会同意，怕其劝阻影响干部的动向，即瞒着赵进行，待木已成舟赵也就听其自然了”。“南桂馨从辛亥革命至天津市长辞职以前的时期内，除掌山西警政外，所有对外最棘手的事，总是派南去做。如果说赵是阎的左手，南就够得上阎的右手了”。（以上见《山西文史资料》阎锡山使用干部的手腕）阎锡山为维护他的统治，也需要在社会上网罗一些有才干有声望的人，祖父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阎锡山以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为旗号，祖父在任内务司司长兼财政司司长时，以多留地方税，少交国税支持了阎，但这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1914年袁任金永为内务司司长，并以本省文官回避之政策，将山西籍的文官几乎一网打尽，从此山西陷入困难时期。（以上见《山西文史资料》南桂馨之回忆）此后，祖父到阎锡山手下都督府任书记官兼山西保晋公司总理。阎任山西省长后（1917年），任祖父为山西六政考核处处长，举办水利、蚕桑、禁烟、种树、剪发、天足六政，复增办畜牧、造林、种棉三项；1918年祖父被推为山西省议会议长，兼留日预备学校校长、育才馆教

务主任；1922年8月，又任山西政务厅厅长；1923年任河东道道尹；1926年兼任山西河东盐运使。1927年北伐后，助理平津卫戍事宜，任特务委员长。从上面任职中可以看出，阎锡山任祖父的职多是为他支撑门面以取信于民的事。在与阎、赵、南共事中，祖父渐渐了解了阎的一些做法，他对阎、赵、南不满意，长期政见不合。阎对反对他的人，一贯手段毒辣，如“商震要独立自主，就处处防商，最后逼商离开山西。傅作义因守涿州与奉张发生关系，从此对傅存有芥蒂，逼得傅和他分家。李生达赴江西‘剿共’与蒋介石发生关系，回晋后买通其马弁刺杀之”。（《山西文史资料》阎锡山使用干部的手腕）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常和他争辩是非，但祖父的才能和在社会上的声誉他又不能不顾及。同时，祖父与南桂馨、赵戴文的矛盾也在加剧。一些同僚为缓和他们的矛盾，便从中做媒，让他们结为儿女亲家，祖父的女儿嫁给南家做儿媳，赵的女儿嫁到崔家做儿媳。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便使阎对祖父也不能怎样。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

全会，改组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全面篡改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4月，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为了解除奉系的军事威胁而拥蒋，蒋、冯、阎、桂四派的军队打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旗号，发动了对张作霖的“北伐”。同时，阎锡山又派南桂馨与日本驻津屯军司令新井龟太朗谈判，由于日本支持晋系军进驻天津，直鲁联军张宗昌撤出天津。6月12日，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占领天津，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天津被定为直属国民政府的七个特别市之一。阎锡山首推功臣南桂馨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但南任职不足三个月，即在天津舆论下不得不辞职。北平报纸登了别人控告南桂馨的七大罪状，天津大公报9月7日五版也登出“天津各法团领袖前晚集议在南市长未交代之前，函请将抵津后一切款项用途详细公布，以释群疑。公函内容略谓南市长向以清廉自矢，应请公布疑项用途以照大信”。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才意识到天津并非山西，如不派真正有能力的人去，恐怕他连天津也站不住。为此，“阎锡山保崔廷献继南桂

馨，须中央批”(9月5日二版)，“今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天津特别市市长准由崔廷献继任”(9月6日二版)。

祖父将要接任的天津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一方面“四乡驻军二十余万，村民居室被占，食物被掠，市内商店入晚即行闭门，住户亦十分不安，巨案日必数起”；(1929年6月26日十一版，市府昨日之周年纪念会)“天津有市政之名业已多年，但事实上天津只有市政负担，没有市政建设”，“革命势力到达天津业已三月，因为种种原因，市政府没有做出什么成绩”，(1928年9月15日五版，崔廷献昨宣誓就职)“市政府财政困难，不敷开支”，(9月28日五版)“市府财政不但建设事业费无所出，九月份经费支出亦亏数万”。(10月16日二版)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及各军阀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公开反共，白色恐怖加剧。在天津掌握党权的是蒋介石从上海派来的潘云超、王匡初等人，掌握军警宪特大权的是警备司令傅作义、第三十六师师长李生达、宪兵司令袁庆增、公安局局长曾廷毅。也在同期，1928年7月22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举行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少奇、陈谭秋主持。1929年初，中共中央将设

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转移到天津英租界，在毛泽民领导下秘密印刷党内书刊，《(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彭真同志任天津地下党领导，会同薄一波等人领导组织天津工人学生运动，中共派遣共产党员张友渔打入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就在这样情况下，祖父接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他信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更把做天津市长做为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好机会，尽管报纸已先于他向天津民众公布了“崔廷献与南桂馨系儿女亲家”，(9月7日二版)更加重了他的不利环境，但他还是勇敢地上任了。

### 祖父为实现“三民主义政治”之奋斗

1928年9月14日，祖父宣誓就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他说：“廷献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之人，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1928年9月15日第五版。崔廷献昨晨宣誓就职)当时到场的天津市党部代表韩振声发言，希望崔市长能遵照党义“将市政府造就成革

命之政府，廉洁之政府，将一切旧的、坏的恶习铲除，为民众谋利益”；还有代表希望能在用人公开、财政公开基础上，尽快就市政建设、教育、卫生、道路、运输等问题上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来。针对这一切要求，祖父说：“造成革命之政府、廉洁之政府是职务所在，用人公开、财政公开也不必多虑”。接着转到他对天津任职的想法，他说：“今日国民党号召民众者为三民主义。忆光绪二十九年孙中山先生自西洋抵日本，与同盟会人所讨论研究者，即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当时民报所鼓吹者，亦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惟犹不若今兹之具体耳。孙先生之主义，推倒满清后如即实行，今日当已获成良好之成绩，惜乎当时只解决了民族问题之一部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均未实行，其后孙先生为唤起民众实现三民主义起见，费了许多心力，撰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使人有所遵循。孙先生曾说，军政时期一方面应用武力扫除革命障碍，一方面应尽力宣传唤起民众，但截至现在止，唤起民众的工作犹未做到，是以民众对三民主义均未认识，既未认识焉能求其接受。故现在最重要之

工作,当为努力宣传,使民众由认识主义,接受主义,而进于运用民权,然后建设事业可以顺利进行,获取良果;反之,若于民众未认识主义之际,剧尔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则任何忠实之同志与良好之官吏,均将为民众驱逐,而不能安于其位为党国服务。余今年五十四岁,而思想犹如十六七岁之青年,自信爱国热情绝不后人。平生做事,凡有利于国家,有益于民众者,必全力以赴之。三十年来,在东三省在山西任职,只知为国家为地方服务,绝不自认为作官。今兹来津,亦将一本平昔之念,实事求是,努力尽职,就渐进、和平、公道之原则,以谋市政之建设,并以十二分之诚意,接受各界切实可行而有利于市民之意见,将来成绩虽不可知,但愿以唤起市民,使能运用民权,达到市民自治,市长民选之目的自勉。故事实上余此来工作,可谓施行市政之预备工作也。”(1928年9月14日二版。崔廷献今晨就津市长职。)

因此,祖父上任伊始,就开始为他的理想奋斗。在半个月内就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广开贤路征询意见。自9月15日至

28日，在《大公报》第一版上连续刊登“崔廷献启事”——“廷献就职伊始恐来宾枉顾有失迎迓，拟于每日上午8时至10时为接见宾客之时间，谨告。”9月19日又去访河北省商会联合会会长张造卿，征询市政意见。

第二，惩治舞弊官吏。9月17日“崔市长据胶皮车工会代表控告‘工巡捐务处处长王毅借更换车牌剥削车夫，营私舞弊，请予查办’，崔氏当即下令将王撤任，令刘氏稽查办理，据实报核。”9月26日五版又登“崔市长为整饬官规，剔除职弊起见，特下手谕，派吕密查员赴各机关切实调查有无舞弊情事。该员昨查到天津邮包税局，查悉该局收得邮包税一宗，计洋235元，乃竟付税者以17元之收据一纸，即此一宗已吞款218元，其平日舞弊情况何堪设想。经吕报告崔，崔以水××在党治之时仍敢营私舞弊，殊属法无可贷，当令特别二区主任王固磐派便衣探警5人到该税局，将水××及该局司账杨某一并捕拿，送交公安局惩办，以儆效尤”。

第三，市府减政。“(1)各机关撙节开支，……腾出经费以为补助建设之用，否则仅有行



政人员经费而无建设之款，势必不能办事，实无以报党国对市民也；(2)公用局暂行裁撤……(3)土地局原四科并为两科……”

第四，注重公安人员思想建设。9月15日上午十时，“崔市长在市政府对公安局六大署长，各区署员巡官及保安队总教练官，各分队队长训话：(1)警察任务在于维持公共治安，一个警察若不能维持公共治安，一个警察若不能尽此责任，则全市市政即受影响，市长亦不免不尽职，故警察必须勉尽其责；(2)警察旧人饶有经验，自堪重用，绝不更动，惟旧染腐化习气者，则须立刻涤除，一切嗜好尤不得稍存；(3)现在本党行以党治国警察亦须党化，除维持公共治安外仍应实行党化，欲实行党化必须了解三民主义，了解之后必须向人民宣传，最后相嘱二语，即‘什么叫三民主义’与‘为什么要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到场者均须切实研究，一二星期后本人或将向大家一一考问云云。嘱当场官长通知未到场者于今日九时再到市政府听受训话云”。

第五，把修路当做繁荣天津、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件大事去做。9月16日，即“命令市政府